



板升：明代民族交融的缩影

□ 蔡亚龙

明代是统一多民族国家巩固和发展的时期，嘉靖以后汉人与蒙古人的经济、文化互动出现了新高潮，塞上出现了二者共建、共生的“板升”。何为板升？《明实录》言“板升者，华言城也”，陈仁锡《无梦园初集》也认为“犹华人言村落房屋也，桑种饮食悉如中国，所变者胡服耳”；亦有学者考证蒙语中的“板升”实源于汉语中的“百姓”一词，用以称呼到塞外谋取生计的汉人。不管“板升”是言城池房屋，还是指族群人口，但毋庸置疑的是，“板升”是以从事农业生产的北迁汉人为主，在塞上新形成的定居聚落。众所周知，山陕地区大量汉人移居塞上的人口大迁徙，被概称为“走西口”，其与“闯关东”“下南洋”并称为中国近代历史上三大移民潮。而早于“走西口”大规模发生的清代和民国初年，明代嘉靖以后出现的“板升”，已然在塞上聚居了大量汉人，它既是“走西口”的前奏，又是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历史的缩影。

板升的壮大与经济

塞上的汉人最早应是被蒙古人掳掠而来，方逢时《大隐楼集》记载俺答汗部落每年掳掠成千上万的汉人，以驱使他们为草原部落耕种庄稼。甚至身居玉林卫万户的武官杨威亦被掳掠，似杨威这股被蒙古人掠取的汉人虽不在少数，但更多的汉人则是自愿北迁，以叛逃军、白莲教教众、流民为主。如嘉靖十二年（1533年）大同兵士因总兵官李瑾治军严苛合谋发动兵变，事后不少叛卒不得不投向蒙古部落。白莲教教徒亦是北上蒙古部落的重要力量，丘富即是其中代表，嘉靖年间他曾率领信众投奔俺答汗，成为俺答汗麾下重要谋士。丘富建言俺答汗要把开垦田地摆在首要位置，只有以农耕为务，方能广积粟米、积蓄力量，俺答汗对此十分认同。于是在丘富等汉人的谋略和组织下，俺答汗在丰州（即今呼和浩特）建筑城池和宫殿，开垦良田数千顷，并在周边集中安置汉人，汉、蒙人民共同生活的

板升由此开启。草原地区本以游牧为主业，很少有城郭和定居之所，相较于中原地区而言，经济生活较为单一、落后，因而需要通过贸易、掠夺等方式从汉地获得必需的生产生活资料。嘉靖年间汉人的涌入，给草原带来了先进的生产力和生产技术，恰是扭转草原被动经济局面的契机。以俺答汗为代表的蒙古贵族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他们在前期役使汉人开垦田地且小有收成的试验成果下，逐渐把发展农业、手工业等多元经济上升为重要政策。

嘉靖二十五年（1546年），驰骋疆场的俺答汗从战马上，亲自一跃而下，用两银牛开垦了田地五六顷，播撒了谷、黍、蜀、秫、糜子等农作物，还动手建造了一口窑，躬行参与到农业和手工业生产中，以示对发展多元经济的重视。新鲜的农业劳动生活也让他十分愉悦，发出了不再征战、归休田野的感慨，他还派使者前往大同等地，请求明朝派遣木工、画工、铁匠等手工艺者帮助他在丰州川建造城池。次年，俺答汗又大会保只王子、古囊台吉、把都台吉等蒙古王公，畅谈他发展农业的新政策，以及入贡明廷请求赐予耕具、种子的主张。俺答汗经营板升、发展农业的策略很快进入了良性循环。《五杂俎》记“临边幸民往往逃入虏地，盖其饮食、语言既已相通，而中国赋役之繁、文罔之密，不及虏中简便也”；可见板升的日常生活与中原已无明显差异，且在板升耕田要比在中原的赋役负担轻得多。对于边地流民、百姓而言，板升颇具吸引力，于是他们纷纷北迁塞上，以谋生计。汉人源源不断地到来，板升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嘉靖后期丰州川良田已多达万顷，村落也有几百个之多。不独俺答汗经营下的丰州川遍布板升，据《登坛必究》的描述，自丰州沿着黄河河套一路向西，直到多罗土蛮部的住牧之地，各处都是隶属于麦力民台吉与大成台吉大大小小的板升，可见蒙古右翼诸部皆仿效丰州川发展板升经济，板升在河套以北地区已然是普遍存在的。

此外，在俺答汗长期坚持封贡、

互市的请求下，隆庆五年（1571年）双方达成协议，结束了近二百年的战争状态，数千里军民安居乐业，不用兵革，边塞萧条的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和发展。据《明实录》和《万历武功录》记载，万历初年板升汉族移民可能已达十万之众。他们所耕种的粮食，成为蒙古部落主要的食物来源，草原部落创历史地实现了粮食自给自足，塞上成为农业丰收的沃土。明朝总督方逢时《塞上谣》描绘了塞上人民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人言塞上苦，依言塞上乐。胡马不闻嘶，狼烟净如濯。时雨既降沙草肥，丁男释甲操锄犁。夫耕妇馐朝复暮，单门鸡犬皆相依。”明末清初的顾祖禹也在《读史方輿记要》言：“南至边墙，北至青山，东至威宁海，西至黄河岸，南北四百里，东西千余里，一望平川，无山坡溪涧之险，耕种市廛，花柳蔬圃，与中国无异”，足见此时的塞上是多民族人口安定、富足生活的乐土。

文化习俗的融通

农业经济发展之外，板升还促进了汉地和草原百姓在风俗、文化、医药等方方面面的交流，草原地区的社会生活进入了全新的层次。草原百姓旧俗简单，饮食时并无使用筷、碗等饮食工具的习惯，而是以木盆盛食、以手抓食，日常服则则以动物毛皮制品为主。明代后期汉人的到来以及汉蒙人民的长期交往，在无形中重塑了蒙古人的习俗。如在饮食上，蒙古人已普遍使用木碗、木杓等餐具，贵族则使用更为精美的银制餐具。服饰上则喜锦衣，丝织品成为着装风尚，明人穆文熙有诗句言“少小胡姬学汉妆，满身貂锦压明珰”，便是蒙古女性着汉服、化汉妆的真实写照。瞿九思在《万历武功录·俺答列传》总论中亦记载北地的衣食居室悉如汉制，可知明后期汉蒙百姓交流交融之深入。

草原地带文化水平总体较低，文献所称蒙古人中少识字之人或过于武断，但亦可见草原部落能读写文字

的“榜什”（意为“有学识之人”）的确十分稀少。随着汉人的到来，文字的普及度有所提高，文献言北地的识字之人皆是来自内地之人。此外，俺答汗十分赞同谋士丘富等人提出的吸纳中原有识之士的建议，他曾在大帐外悬挂告示，招揽中原孝廉诸生到塞外来。草原上精通文字书写的民众越来越多，史载“榜什”颇为殷众，草原地带的文化教育水平迅速提升。

中医药也是汉蒙交流的重要内容。板升许多汉人头目便熟知中医药学，如周元素以医术闻名；赵全曾藏匿应州城中，买乳香、地黄、良姜等多种药材。以他们为代表的汉人将中原地区的中医药知识和药材带向草原，改变了草原百姓病不服药，往往听天由命，少有长寿的落后情形。甚至草原人最害怕的天花等传染性疾病，在汉人到来后也有所好转。《北虏风俗》记载蒙古人一旦出现天花病人，父母、兄弟、妻儿均因担心传染不得不躲避起来，患者难以得到有效的照顾，而汉人的出现为患者的救治提供了便利，照顾天花病人的差事往往交给具有抗体的汉人，患者的存活概率因而大大提升。

文化习俗的交融是双向的，移居塞上的汉人同样受到蒙古文化的熏陶和影响。俺答汗的义子柳根子本就是汉人，径自融入了蒙古社会。板升汉人不少给子女取蒙古名或蒙汉合璧的名字，如赵龙育有六子，依次取名为火泥汁、窝兔、瓦拜兔、瓦十兔、簿合兔、宁安兔。而在明朝官员看来，板升汉人长久处于夷地之中，狼子野心终不可驯，且他们沾染夷俗、胡服胡语，故被蔑视为“汉夷”，以与“真夷”蒙古人相区别。换个角度来看，“汉夷”的出现恰是汉蒙文化交流交融的见证。

回顾板升成长的这段历史，四百五十年前，双方达成“隆庆议和”；四年后，俺答汗在丰州川所筑城池得万历皇帝亲赐“归化”城名（即今呼和浩特）。板升作为塞上多民族经济交往、族群交流、文化交融的载体，是上述民族团结大事件的推动者和见证者，谱写了中华民族共同发展的华丽篇章。

马革裹尸是一则来源于历史故事的成语，有关典故最早出自于南朝·宋·范晔《后汉书·马援传》。马援（前14年—49年），字文渊，扶风茂陵（今陕西兴平东北）人，乃东汉开国大将，封号伏波将军。马援胸怀“死于边野，马革裹尸”的磅礴之志，一生征战沙场、戎马倥偬。智取陇蜀，堆米为山；西平诸羌，安定百姓；南伐交趾，吏士见其皆诚服；北遏乌桓，敌军闻风纷纷逃散；最后殁于平叛五溪蛮的前线，终以马革裹尸还葬，无愧当年诺言。

历史无言，精神不朽。马援为天下统一、国泰民安而驰骋疆场的事功印刻于史册，其忠勇赤诚、谦逊有礼的高尚品行更流芳千古，后世无不以其大义为标榜、为其忠勇而赞叹、闻其生平而潸然。

胸怀大义，一片赤诚 保江山

西汉末年，百姓怨声载道、民变四起。初露头角的马援心系天下、忧心黎民，在经过一番斟酌思索后，“择明主而佐”，毅然决然追随刘秀，以赤胆忠心、才智谋略支撑家国大义，为刘秀重新一统天下、开创“光武中兴”立下赫赫战功。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新莽政权灭亡后，天下呈分裂割据状态，公孙述与刘秀各据一方、自立称帝，实力稍弱的隗嚣则盘踞陇右、自称西周大将军。此时，马援为隗嚣招募并深受器重。随着公孙述与刘秀先后称帝，处于弱势的隗嚣派马援探听虚实。马援亲眼所见公孙述“不吐哺走迎国士，与图成败，反修边幅，如儒人形”，而刘秀“经学博览，政事文辩，前世无比”。同时受到两帝垂青的马援，不受人情束缚，作出客观评价：公孙述乃“井底蛙耳，妄自尊大”，刘秀则“才明勇略，非人敌也”。时间识人，岁月识心。经过长期观察，马援决定辅佐刘秀，并诚心劝说隗嚣归顺明主。纵然后来隗嚣阴奉阳违、发兵拒汉，马援亦忠心耿耿、不改其志。

建武八年（公元32年），隗嚣听信奸佞挑拨起兵谋反，刘秀亲率大军讨伐。当部队陷入进退两难之境，刘秀紧急召见马援，向其征询进兵意见。马援行军数载，惯擅兵法谋略、运筹帷幄，他跟刘秀详细分析当下形势，断言隗嚣的部队早有分崩离析之兆。又以米盘排兵布阵，以米粒堆成山川河海、高山沟壑、城镇都市，透彻分析战局，刘秀大赞：“虏在吾目中矣。”“堆米成山”成为后世军用沙盘的鼻祖，既是军事史上的伟大发明，也是马援以智慧与赤诚辅保江山的生动见证。

谦逊有礼，躬体力行 正家风

“正家而天下定矣。”古时那些子孙多贤达、功业多卓著的名门，无不与其良好家风的传承息息相关。身居朝堂沙场，马援处处展现大义凛然、赤胆忠心；面对家人亲友，马援则身体力行、率先垂范，强调谦约节俭、廉公有威，不可轻薄礼仪、失却分寸。

马援南伐交趾期间，听闻马严、马敦两侄儿喜与轻浮的侠客结交，并好讥笑他人之事、妄论他人长短。马援深感不安，亲自为侄儿寄去一纸家书，言辞恳切地劝诫他们慎交友、戒妄议，希望晚辈多结交交像龙伯高一样敦厚谦逊、谨言慎行之人，不要行事作风流于轻浮、自大狂妄。他语重心长地说：“好议论人长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恶也，宁死不愿闻子孙有此行也。”字里行间，是为子孙长远计的远见，是爱之深责之切的教导。

《后汉书》记载，马援之女明德皇后生文尔雅、知书达理，对待君王不矜不伐、娓娓进谏，对待长辈孝顺恭敬、婉静有礼，被誉为“德冠后宫”之贤后。明德皇后之德性养成，离不开马援的谆谆教导与清正的家风熏陶。

忠勇无双，马革裹尸 终还葬

马援功勋显赫却不贪图名利，终其一生为国效力、尽忠职守，始终担忧自己德不配位、无功受禄。他在朝廷上不结党营私，在战场上身先士卒，以此报答国家的信任。

建武十一年（公元35年），马援官拜陇西太守，边塞战事频发，他带领部队勇猛奋战，即使被火箭射穿小



□ 刘 瑜

腿，仍坚持指挥将士横扫敌军。三年后，马援从西南方打了胜仗回到京城洛阳，亲友们都高兴地向他表示祝贺。其中有个名叫孟冀的，以足智多谋闻名，是马援的老朋友。他对马援说道：将军啊，大丈夫沙场立功，此番得胜还朝，皇帝定有封赏，高官厚禄，封妻荫子……不料，未等孟冀说完，马援就皱着眉头对他说：我本指望先生能说些指教我的话，为什么先生也随波逐流，一味地夸奖我呢。见孟冀不语，马援说：男儿不应该安安稳稳地躺在自己的床上死去，然后被子孙用棺材敛尸埋葬。大丈夫战死沙场，用马的皮革裹着尸体回来埋葬，这才是值得骄傲的事情啊！

建武二十四年（公元48年），南方武陵溪五溪蛮暴动，马援虽年过花甲，仍请战自荐：“臣尚能披甲上马。”刘秀见其豪气未减、壮心未已，由衷感叹：“大丈夫当如是也！”平叛途中，马援已身染重病，仍忧国事。每当听到敌人逼近、击鼓叫喊时，仍会拖着病体察看敌情。虽因决策失误而陷入险境，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仍不放弃希望，践行了“男儿要当死于边野，以马革裹尸还葬耳”的誓言。麾下将士无一不为“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勇毅所动容。

马援荣耀一生，身后却遭奸佞陷害。原本为抵御暑热瘴气而从南方运回的薏苡种子，被别有用心者污蔑为“明珠文犀”。马援终以莫须有的“明珠文犀”，名灭爵绝、凄凉下葬。正当亲朋故旧纷纷避之不及、生怕引火上身时，唯前云阳县令朱勃挺身而出上书鸣冤，诉说马援一生功绩及身后凄凉。“海内不知其过，众庶未闻其毁，卒遇三夫之言，横被诬陷之谗。”辞意哀切令刘秀动容，然空余怅惘。

马援为国效力数十年，西征塞外，北抵沙漠，南渡江海，在瘟疫瘴气中战死沙场，却落得一个褫夺封号、蒙冤待雪的悲凉下场。荣耀与悲哀相互交织，使其人生充满悲剧性色彩。历史长河奔流不息，千秋功罪后世评说。马援以“常恐不得死国事”的一腔孤勇、“穷当益坚，老当益壮”的青云之志，支撑起为家国安定冲锋陷阵、为苍生黎民出入生死的忠勇之驱。这份操守与坚贞，感动的不仅仅是朱勃，更是后世无数人。



（上接1版）

坚持敢于监督、善于监督、勇于开展自我监督。在党的领导下，对司法机关办案活动进行监督，检察机关是在诉讼程序中履职的专门监督部门。坚持敢于监督，切实解决法律监督难、软问题。2018年5月，最高检针对派驻监狱检察人员相对固定、监督敏感性不强甚至被“同化”问题，开展监狱巡回检察试点，改“派驻”为“派驻+巡回”，成效明显，被纳入修订后的人民检察院组织法。进一步落实中，又创新开展省内、跨省交叉巡回检察，既监督监督执法，更纠正驻监检察不力问题。最高检直接组织两轮跨省交叉巡回检察，发现并监督10所监狱整改狱内毒害、涉赌等突出问题，推动查处职务犯罪。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坚决防止以刑事案件名义插手民事纠纷、经济纠纷”的重要指示精神，2021年最高检会同公安部出台意见，共同设立侦查监督与协作配合办公室，加强对立案、侦查活动的监督。坚持善于监督，做到政治智慧和法治方式有机结合。办理公益诉讼案件，最高检明确提出双赢多赢共赢理念，坚持诉前实现维护公益目的是最佳司法状态，梯次以磋商、诉前检察建议促进源头治理，绝大多数案件在诉前解决了公益损害问题。对检察建议不能落实的，则依法提起诉讼，办成法治样本。公益诉讼检察工作全面推开以来，共立案办理63.5万件。坚持勇于开展自我监督，强化追责惩戒。最高检党组提出，纠错不能止于国家赔偿、追责必须落到责任主体。2021年对2018年以来改判纠正的246件刑事错案启动追责，错误关押10年以上的22件直接督办，从严追责问责511名检察人员，以责任追究倒逼司法责任落实。不断健全完善检务督察、检察官惩戒等内部监督机制。

巩固深化司法体制改革。持续抓实以司法责任制为重点的司法体制改

革，制定2018—2022年检察改革工作规划，巩固深化检察人员分类管理、检察官办案责任制、检察人员履职保障等改革举措。自觉强化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制定修改刑事、民事、行政、公益诉讼办案规则，严明检察官权力清单，全程、同步、动态监督司法办案。制定检察官员额退出办法，建立员额省级统筹、动态调整机制。落实担任领导职务的检察官带头办理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制度，同步强化检察长、业务部门负责人监督责任。今年专门部署全面总结司法体制改革、检察改革情况，切实做好“精装修”，确保各项改革举措在巩固中深化、在深化中提升。

强化大数据赋能法律监督。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运用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现代化水平。”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违法犯罪都有一个信息链条，孤立看链条上的每个信息点很难发现问题，运用大数据筛查、比对、碰撞，信息点之间就有了交集、串连，问题线索就能清晰展现出来。浙江检察机关通过建立多种形式的数据互联、共享平台，从海量数据中智能分析发现监督线索，成案数量倍增，质效明显提升。最高检专门部署实施检察大数据战略，推广浙江经验，以“数字革命”赋能新时代法律监督。2020年全面部署应用“民事裁判智慧监督系统”，积极运用大数据提升虚假诉讼监督质效。

锻造忠诚干净担当 的过硬检察铁军，以更强 本领让以人民为中心落 得更实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建设德才兼备的高素质法治工作队伍。”检察机关积极适应新时代法治建设需要，

持续铸魂、固本、强基，把今年确定为质量建设年，自觉以更强本领落实以人民为中心，持续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过硬检察铁军。

抓融入为一体的政治与业务建设。最高检党组提出，政治素养是最根本、第一位的专业素养，专业能力是落实监督办案“从政治上看”的基本能力。全面加强检察机关党的建设，以更强党建引领更高质量自觉履职。扎实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把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六中全会精神融入党史学习教育一抓抓实，自觉赓续人民检察制度与生俱来的“红色基因”。组织编写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的检察履职教科书、检察“十大业务”系列教材，一体提升政治素质和业务素养。推动法官、检察官、人民警察等同堂培训，树立、更新共同司法理念。

以永远在路上的韧劲巩固深化检察队伍教育整顿成果。坚持严管就是厚爱，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管党治检。扎实开展检察队伍教育整顿，刀刃向内清除害群之马，猛药去疴整治顽瘴痼疾，抓源头本健全制度机制；落实“自查从宽、被查从严”政策，2800名检察人员被依纪依法查处，其中移送追究刑事责任202人。接续推进七轮系统内巡视，实现最高检党组一届时期对32个省级检察院党组巡视全覆盖；今年又部署开展巡视“回头看”，一体抓实问题整改和系统治理、源头治理。持续落实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领导干部干预司法活动、插手具体案件处理的记录、通报和责任追究规定》等“三个规定”，全国四级检察院贯通，上下联动、相互印证，“有问必录”形成自觉，有效防治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2021年检察人员主动记录报告有关事项16.2万件，是2020年的2.4倍。

务实推进科学管理。科学管理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挥棒”，必须向